

大
国

马 敏 严昌洪 等著

D A N G D A I

ZHONG GUO



d a n g d a i z h o n g g u o

当代中国

——东方巨人的崛起

研
究
从
书

世界不是大国的

但是没有大国

世界绝不精彩

新世纪之光已经照亮

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痛苦与欢乐

发展与繁荣

无不与大国的作为休戚相关

关注大国——它们过去是

今天是

将来也是历史星空中的最亮点

贵州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

——东方巨人的崛起

马 敏 严昌洪 李志茗 龙汉武
周凯军 谢 冰 李里峰 黄华文 著
田 彤 王永恒 熊志勇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亦赤 钱 治

封面设计:曹琼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严昌洪等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9

(大国研究丛书)

ISBN 7-221-05237-9

I. 当... II. 严... III. 中国 - 概况 - 20 世纪

IV. K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101 号

当代中国——东方巨人的崛起

马 敏 严昌洪 李志茗 龙汉武

周凯军 谢 冰 李里峰 黄华文 著

田 彤 王永恒 熊志勇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规 格	850×1168mm
开 本	32
印 张	18.5
印 数	0001—2200
字 数	455(千字)
版 别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1-05237-9/D·201
定 价	32.00 元

导 论

20 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几点思考

—

20 世纪对世界历史进程而言,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一百年。这一世纪的前 50 年以动荡不宁的战争和革命为主线,人类先后经历了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从西半球到东半球,无数的人因战争和动乱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这一世纪的后 50 年则基本以和平与发展为主线,在冷战的阴影下,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涌起的工业化浪潮迅速在全世界扩展,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取代老牌的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曾一度落后的东亚迅速崛起,并非天方夜谭的所谓“太平洋世纪”已初步显露其端倪。

20 世纪对中国历史进程而言,也同样是天翻地覆的一百年。自上世纪中叶在屈辱和震惊中被打开国门后,顽强的抗争与变革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未停息过。尽管 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无数次的内外战争和流血曾使她疮痍满目,但她却目睹了改革和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变革,目睹了因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的的确确地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从世纪初一个贫弱落后的东方老大帝国变成一个雄踞东亚的社会主义强国;从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地变成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有力竞争者,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已可以说“不”,世界不得不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虽然不敢轻言

21 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是无可置疑地大大提高了。百年历史,百年巨变,20 世纪的中国有着太多有声有色的故事。

二

那么,即将逝去的 20 世纪历史进程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

如果用最直接、最简单的字眼来概括,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20 世纪历史进程的最本质的特征,便是历史在地理空间上的迅速的横向展开以及由这种横向展开所造成的巨大历史发展力量。全球化、一体化和网络化正是对 20 世纪历史运动特征的最好概括。

历史固然是人类社会在过去时空中活动的轨迹,但人类近代历史与前近代历史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运动轨迹。如果说漫长的古代农业社会一般是封闭和独立发展的,各个农业文明国家在缺乏横向联系的情况下,形同孤岛般浮沉于世界的海洋,那么,近世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全球性和一体的,呈现出横向展开的态势。从欧洲涌起的工业化浪潮无可阻挡地冲向世界每一个角落,强迫所有落后的农业民族改变其自然历史进程,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发展——绝对服从世界市场和工业化的需要。生产力的迅速增长缩小了诸社会和诸国家间的距离,从前各民族划地为牢、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国之间的彼此渗透和互相依赖所取代。这是一个内在联系和横向交流日益密切一体化发展的新世界、新时代。

空间传动机能的增强和横向展开所释放的巨大势能,不仅把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外界的沟通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根本标志。

空间联系增强的结果,首先对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方式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刺激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20 世纪是国际市场和世界贸易空前扩大的世纪,近代空间的传动型历史运动从一开始便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经济意义上的

空间拓展实质上就是商品在最大范围内和最大程度上的流通。正是为了实现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并享受其巨大的经济效果,人们不得不组织起来跻身于全球性的经济开发,形形色色的公司、工厂、银行、交易所等经济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那种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田园诗般的农耕时代已成明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

与空间联系增强相伴随的是时间距离的缩短。过去一国或一地区经济的明显增长往往需要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周期,但近代经济的发展却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密切的空间联系和发达的通讯手段促成了技术的迅速转移。像中世纪手工工匠般保守技术秘密已不太可能,也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技术的创新和发明。后发现代化国家可以依靠广泛的科学技术转移和精心组织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赶上发达国家。一般西方国家在两三百年间所完成的现代化过程,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如能善用前者的经验,仅仅用一百多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在东亚地区,日本、新加坡、韩国等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正是典型的范例。这种经济上的加速度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经济竞争本身出现日益地区化、国际化和集团化倾向。

历史在空间的横向展开,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相互交流,创造出一套世界性的话语系统,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已清楚地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随着几代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人类已开始进入信息时代,对信息量的拥有,其重要性已不亚于对知识、技能和能力本身的拥有。衡量一个人的社会活动能量,有时仅仅凭其与外界通讯量的大小,便可以作出基本不离谱的判断。那些成天忙于处理信息,信箱里总是塞满了信件的人,或办公桌上的电话铃成天响个不停的人,往往就是有能力和比较重要的人物。新近产生的“国际信息高速公路”更使全球共时性的享有信息和处理信息成为可能,世界又向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所谓“地球村”的说法,已不再是想入非非的天方夜谭。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跨国公司、经济圈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话题。当我们一天早晨突然醒来,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奇诡的循环圈和因果链中,我们个人拥有的空间增大了,但世界的空间距离却大大缩小了。

从空间运动的角度来观察,20 世纪的中国史,正是中国从一个封闭、保守的封建帝国逐步实现自我开放,走向世界的历史。中国的每一次发展,都同地区性联系的加强和同国际社会相接轨分不开。现代化以其特有的扩张力极大地拓展了 20 世纪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无可避免地被纳入工业文明的世界一体化发展之中,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渡。

三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或转型,本质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它有两层最基本的涵义:其一,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质变过程,通常要延续较长的时间,是一个持续性的社会结构变动过程。欧洲的近代社会转型,起源于 15 世纪末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时期,完成于 18 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前后约 300 余年。中国古代社会所发生的由领主制封建经济向地主制经济的大转型,也是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的转型期才最后完成。而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在整个 20 世纪加速进行,已持续了 150 年之久,至今尚未最后完成。作为一种社会质变,社会转型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但更多地则体现为量变的积聚过程,因此,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的调整 and 改革来加以完成。其二,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发展相联系。(1) 这种结构性变动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

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过渡。(2)转型意味着在持续的结构变动中从一种稳定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结构状态过渡,呈现出阶段性特征。(3)在结构转型期间,由于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因而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社会分工的加强,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参与渠道的扩大,都使人们的身份和角色处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从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一种“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往往使个人和组织丧失对自身角色的认同,陷入经常性的角色冲突之中。

从工业文明传播和工业社会成长这条历史主线看,中国 19 到 20 世纪社会转型与世界范围内的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大转型、大过渡并无本质区别,而是属于这种世界性潮流的一部分,系现代工业文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局部。因此近代文明起源与演进的一般规律同样适合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析。

同欧洲工业化前的过渡时期一样,中国 19 到 20 世纪社会转型实质上表现为一个新旧社会结构的替代过程: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社会旧结构的松动、萎缩、解体;另一方面则是工业文明新社会结构的潜滋暗长,逐步排挤、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于是,社会呈现出转型期所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特征:在这一时期,传统封建主义关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经出现极大的危机并不断衰落,但封建法权关系却未根除;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发展起来,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经济的原则却未在法律上得到确认。这两种根本冲突的价值观便同时出现在同一社会时空中,呈现出混杂性和歧异性。旧的社会系统的解构与新的社会系统的建构构成近代社会转型的二重基本运动。近代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和冲突均是围绕着这二重基本结构运动而形成、展开,衍成多姿多彩复杂曲折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关键就在于解读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历史运动的特殊性及其具体展开形式。

具体而言,在近现代中国,受到严峻挑战的一极系延续两千多

年之久,高度一体化的农业宗法社会结构。该社会结构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中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型”,其后成为一种“定型”,延续两千余年没有发生根本上的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结构的的经济主要是与家庭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家庭作业,分散经营,生产规模细小,生产技术落后,经济活动以个人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缺乏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理性引导与市场结构,农产品商品率极低、基本维持在糊口农业的低水平。建筑于小农经济上的则是以宗族为核心的农村社会组织。宗族组织以血缘为纽带,以亲情为经纬,通过宗祠、祖塋、族谱、族规、族长等形式,将农村社会构筑成一个紧密的社会集体。独具一格的宗法制度不仅适应了小农经济的需要,也为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集权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基础。于是,小农经济、宗族制度、官僚政治便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侧面组成了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框架。同时,它又因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意识形态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体化,处处渗透和表现出一种以伦理为中心的历史传统与精神,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融为一体,从而获得了长期稳定、“千年不变”的合法性思想资源。

因此,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解构,实质上就是特指上述超稳定和一元化的农业宗法社会结构的解体过程。这一解体过程,首先表现为其构成要素的逐步消解、破坏,诸如在近代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沿海地区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形式的破坏;因农村破产而造成的流民和隐性失业;城市化对宗族组织的冲击;中央政权的权威性和控制力消弱;等等。其次,它又表现出结构要素之间的耦合性的松动。最明显的表征,便是使农业宗法社会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结构整体的儒家意识形态逐渐丧失其权威解释地位,不复再能担当与政统和族统相配合的道统角色,遂引起整个农业宗法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危机。

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解构相对应,则是新的工业社会结构的建构过程,也就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过程。如前所述,在近代中国,这一结构性变动过程实际上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及甲午战后对西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大规模引进,即所谓“投资设厂”的热潮。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社会存在最根本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的存在。而由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又成为整个社会存在发生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因素。“投资设厂”(即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采用工厂制度)这一小小的举措所引发的一连串惊世骇俗历史后果,往往是作俑者们所始料未及的。它直接将西方工业文明之“体”移植于“千年不变”的农业宗法社会,造成与小农经济截然对立的另一种经济基础,触发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形变之链”。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叶,系中国工业化的萌芽阶段,在此阶段中国共约设立新式厂矿750余家,资本额约155479千元。1914年至1936年系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第一次欧战期间,中国新兴工业曾一度蓬勃发展,1912年至1920年,中国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曾高达13.8%,整个民国时期则为5.6%^①。这以后由于军阀割据、内战频繁,发展速度放慢,但从1926年到1936年这10年间,中国现代化工业平均增长率仍维持在7.6%。基础工业在这一时期有较为长足的进展,1926年电力产值占中国现代工业的11.2%,到1936年已占22.2%。作为现代工业支柱的棉纺业,1922年全国共有纱锭238万枚,布机1.2万台,到1936年增至纱锭510万枚,布机5.8万台,14年间增加1倍多^②。

工业经济的成长,必然连带引起政治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相应变化;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必是民主化与自由意识的增

① 章长基(John K. Chang):《中共统治前中国工业的发展》,芝加哥,1969年版,第70~74页。
引自郑竹园:《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及启示》,文载:《现代化研究》(台北)第1卷,1995年版。

②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4~135页。

长。机器生产、工厂制度、民主程度、社团组织、自由意识构成一个环环相衔的有机整体，牵此涉彼，很难任意割裂或随心所欲的取舍。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士大夫改革派的失败，恰在于顽固和错误地坚持“中体西用”的改革模式，对近代西方工业文明采取割裂的态度，只要其“用”，不闻其“体”；只用其“器”，不取其“制”。辛亥革命及民国的建立，意味着当时中国先进的社会力量试图对工业化潮流的全部结构性因素——现代大工业生产、代议制度、民主思想等首次进行全面的整合，并凭借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工业化潮流开辟新发展方向。尽管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种整合的努力最终是失败了，但其开创之功却不可没。社会转型中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的二重社会结构变迁，虽是理论思维的抽象，但却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变动过程，因而具有可归纳性和可观测性。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研究深入起见，曾对这种深层社会结构运动的诸表征作了尽可能全面和高度的概括。例如社会学家 M. J. 列维曾列举出“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特点方面的八点区别，使“工业化”、“民主化”、“现代化”这类概念在内涵上更加具体，更具有可理解性。列维认为：(1)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比较低；(2)在现代化社会，由于专业化程度比较高，诸单位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亲属群体和近邻共同体的自足性比较强，缺少功能的分化；(3)在现代化社会，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情感生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则在非现代化社会，由于家庭、亲属的社会关系比较密切，伦理具有狭隘的个人性质；(4)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的但不是专制，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如同封建制一样，即使在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其性质也仍然是专制的；(5)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制和感情中立，而非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传统习俗的、个别的、功能无限制和具有感情色

彩；(6)现代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而非现代化社会，交换媒介和市场尚未发展起来；(7)现代化社会具有高度发展的科层制组织，而非现代化社会，即使有科层组织，也是建立在“个人说了算”的社会关系之上的；(8)现代化社会的家庭是向小家庭发展，其功能也正在缩小，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是多样化的，家庭功能也是多层次的^①

而更深入一步的研究，则是将数量关系的分析引入对经济社会结构变动的考察，通过一系列的数量指标体系，寻找社会结构的“临界点”。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 A. 英克尔在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6 个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抽样调查后，提出了现代化国家结构特征的 10 项指标。除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外，还包括成人识字率、大学生占人口比重、人口净增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一些公认的重要社会指标。^②这样，社会结构的转型，不再单纯是抽象的概括、推理或客观描述，而体现为新旧社会结构的数量关系上的对比变化，具有了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

具体到中国 19 世纪到 20 世纪社会转型的研究，此时我们要讨论和面对的，就将是若干组体现二元社会结构替代过程的参数指标。关键是如何去确立和正确分析反映这类社会结构变动的参数，从而更清晰地观察和把握社会转型的轨迹。我们尚无法给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全部参数指标，但作为举例，至少可能通过粗略地评估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比重的变化，进而窥测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程度。工业化直接导致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产业结构中新兴工业的比重超过传统农业的比重，工业人口的比重超过农业人口的比重，使社会由农业国进入工业国。英国在 18 世纪末

① 转引自[日]高水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86 年第 4 期。

② 参见 A. Inkeles and Smith, *Becoming Moder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率先实现近代化(早期工业化)之后,整个国民生产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21年英国农业、渔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1770年以前的40%下降到26.1%;工业(包括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比重则从24%上升到31.9%,超过了农、林、渔业。^①日本近代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呈现出清晰的脉络。1885年,日本农业产值的比重高达75.7%,工业产值的比重则为24.3%;到1920年,日本农业产值的比重下降为44.9%,而工业产值的比重则跃升为55.1%,其中近代工业产值的增长占主要部分,这证明日本在20~30年代已基本完成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然而,在近代中国,农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占压倒优势,19世纪80年代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高达66.7%,传统工业产值比重仅为7%。近代工业产值比重,则基本可以忽略不计。1936年,国民总产值中农业产值比重仍占62.31%,近代工业产值仅占5.08%。另据吴承明的统计,到1936年,近代工业(包括全部矿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到1949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还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产值比重则高达80%以上。^②这组产业结构参数指标表明:1949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社会结构转型异常缓慢,现代性仍非常之低。

四

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1949年革命的意义,便在于它彻底摧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畸形社会结构,使中国终于跳出了历史设下的“怪圈”。这样,就给这个古老民族从宗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重新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为在一种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条件。从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

^① 迪恩·柯尔:《不列颠经济发展,1688~1859》,剑桥,1962年版,第156页。

^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化建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后,中国的综合国力有明显增强,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241亿元,比1956年增长7.9%。其中,农业总产值为537亿元,工业总产值为704亿元,比1956年分别增长3.6%和11.5%。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和轻工业的产值各为317亿元和387亿元,比1956年分别增长18.4%和5.7%。工业产值的增长,使国民经济的结构发生较明显的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首次开始超过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57年,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43.3%,轻工业总产值占31.2%,重工业总产值占25.5%,轻重工业总产值占56.7%。^①

尽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后(这一过渡实际上是人为地压缩和提前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对社会主义本身均存在着模糊认识观念。总的说,是过分夸大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性与优越性,忽视了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或许,这也就是1957年以后“左”的思潮不断升温,教条主义空前盛行,以致严重扭曲了工业化健康发展轨道的认识根源。

其实,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否定与超越,但在“大过渡”意义上,其早期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实际是处在同一个大的历史转型期中,同属所谓“转型社会”(或称过渡形态社会),尽管前者较之于后者已向现代工业社会跨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借用罗斯托的术语,在大过渡潮流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当于从“传统社会”到“起飞前期”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相当于从“起飞前期”到“起飞阶级”,并向“走向成熟”阶段推进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持续前进的时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大背景,决定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4)》,今日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5、27页。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面临某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经面临的问题。诸如,传统与现代二重价值取向的艰难抉择;发展不充分的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二元性经济结构;人口与生产的同步增长甚或超前增长;从“自然人”向“经济人”和“社会人”的转化;强调统一与推行民主的内在矛盾;扬弃传统与发扬民族精神,因此,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变,不可能马上解决前一社会形态曾经面临的全部问题和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不过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现代化的征程仍漫长而遥远。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种社会结构的相邻和粘连性,决定了已被摧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混合型结构会阴魂不散,以历史遗传基因的形式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某种结构性制约,使其在整体结构上具有突出的不完善、不纯粹、不成熟的特征,同时也使其不可能脱离原有社会的历史基础而呈跳跃性发展。

结构性制约因素是极其芜杂的。大而言之,一种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制约因素,如国土大、人口多、耕地少和其他无法选择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等。这些往往是对若干社会形态都同时起作用的制约因素。另一种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近代化历程本应解决却没有或无法解决的制约因素。同时也包括由该社会形态自身所造成的新的结构性制约。我们所感兴趣并着重考察的系后一种制约。

首先是来自落后的生产力结构的制约。在社会存在的本体中,生产力是决定一切的。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落后。1949年全国解放时,我国近代生产设备(包括工厂、铁路、矿井等)仅合人民币128亿元;农业则长期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粮食只有2774亿斤,棉花还不到1700万担。在多层次生产力结构中,手工劳动占最大比重。手工劳动所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1936年是89.2%,1949年是76.8%。

其次是缺乏形成民主政治体制的社会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体性政治结构实际上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皇帝—官僚—士绅一体化官僚体制,其明显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和对社会的强控制。尽管也萌生了一些新的民主政治因素,但不仅它们自身已发生了某种变异、扭曲,而且这些因素之间也缺乏必要的整合,无从形成一套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只是作为专制政治的点缀存在,根本不可能转换封建性的主体政治结构。正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未在中国大地生根落户,因此,在封建专制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便整整少了一个中间环节。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终因缺乏现实土壤和必要转化机制而难以结出丰硕之果。

第三是观念变革的有限性所造成的制约。如前所述,由于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和改制的要求压倒一切,没有一个类似于西方的大规模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具有思想启蒙意义,但毕竟“破”大于“立”,而且,如后来的科玄论战、社会性质论战一样,基本上是在知识者圈子内展开和收束,从未深入工、农、商这三个社会主体阶层,所以也并未对植根于小农经济并延续 2000 多年的封建观念形态构成致命打击,更不用提置换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支援下,加之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变革的有限性,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及其相应的心态常常是倒而不死、偃而复苏,严重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伦理观的发展、成熟,并使“人的现代化”进程显得步履维艰。

强调前一社会形态的遗传性结构制约,丝毫不意味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可以脱卸其主观责任。因为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实则是人与社会双向构建的产物。一种经人的选择而形成的开放性社会结构,完全有可能“板结”、“滞化”为某种封闭型结构,失却自身的活力与创新精神,变成新束缚因素。例如,以公有制为主的混合型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曾终于结束了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经济萎缩和政治混乱,使我国国力明显增强,社会安定兴旺。然而,由于错误认为公有制程度愈高愈好,社会组织形式愈集中愈强,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结果使中国社会结构在 50 年代后期出现了背离现代化方向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基本趋势即是层层收权、绝对集中,割断了社会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逐渐形成一种单一、封闭和僵化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发展,使中国又一次痛失经济振兴、走向世界的绝好良机。

总而言之,正是对“大过渡”历史背景的体认以及无可避免的遗传或新生型结构性制约,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一个特殊的、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这一宏阔视角出发预测时代的风云,那么,改革中所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以及可能出现的种种乱子似乎均不足以为奇了,它们不过是历史转型期中应有之事。但是,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对改革进程无动于衷、放任自流,甚或将自己决策和工作的重大失误也归结为“初级阶段”应有之事,视作理所当缴的“学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实为一种庸人和懒汉的肤浅之见,到头来必将受到历史更为严厉的惩罚。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在挑战与应战、制约与反制约、束缚与超越的两极对立中开辟其前进道路的;人之为人的理由,人的尊严和价值,正体现于不断冲破束缚、超越自我的永恒追求之中。

突破结构性制约的现实途径即是自觉地实行结构的创造性转换。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既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冒出来,它只能以原有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各子系统)为现实基础进行整合和重建。革命可以摧垮一种陈旧过时的社会结构,但不可能彻底消灭组成的这一社会的多种元素;革命可以导致政权的更迭,但不可能马上造成一个崭新的社会。

就内容言,实现社会结构的创造性转换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推动社会本体结构的转换,它包括生产力结构、生产